

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情况的调研与分析

□ 王晓军* 隋红岩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坚持为教学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在经费预算和使用方面形成了与战前完全不同的特点,如:通货膨胀造成实际购买力下降;采购教学用书困难;外汇管制;由于战争,即使有外汇也难以及时购得外文书刊等。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 高等学校图书馆 图书馆经费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4.016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带来巨大破坏,使高校图书馆在经费的安排和使用上形成与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大为不同的一些特点。

1 全面抗战对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影响

全面抗战的爆发对高校图书馆经费产生了从国家到高校层面的全方位严重影响。首先,战争迫使国民政府极力增加军费开支。1937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66%以上。到1945年则升至87.3%。又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民国工商业、金融贸易集中的东部地区相继沦陷,给民国经济以沉重打击,造成全社会物资紧缺,并由此形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严重后果。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尽管国民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了899倍,但物价上涨了1940倍^[1]。在上海黄金市场上,成色为0.992的市平10两黄金,1937年可兑换民国法定货币1158元,到1945年1月竟涨至879625元^[2]。通货膨胀对国民政府教育经费的正常安排带来极大负面影响,造成高校经费在表面数字上年年递增,但包括图书在内的各项教学需求物资的购置能力急剧下降。其次,由于进入战争状态,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4日发布密令,规定除军务国防、地方治安、使领馆经费、税警债务、抚恤及关系对外契约或外籍人员薪津各项外,其他各项经费一律暂按原预算七成支发^[3]。教育经费在此背景下急剧减少。根据《第二次中国

教育年鉴》中“战前教育文化经费”的记载,1936年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为55406050元,占中央总预算的4.48%,到1939年,教育经费仅占中央总预算的2.2%,以后一直维持在很低水平。不仅如此,战时教育经费大量用于各级学校尤其是高校师生员工薪俸和膳食的津贴补助,对包括图书馆经费在内的各项教育开支形成更为严重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吸收抗战后备力量,与日伪争夺中高等教育适龄青年的民心,制订一系列对因战争而陷于困境的中高等学校学生的补助救济办法,如:困难学生贷款助学办法;以粮食、食油作价发给学生,保证困难学生基本生活需要;国家急需人才的部分专业一律实行公费等。国民政府还对从战区撤退和流亡的部分国立中学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实行临时救济补助。以后又发展为对非敌占区的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实行生活补助救济,补助办法从增发生活补助金到发米代金,到举办公共食堂等。对学校师生员工的生活补助救济耗用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如1942年的战时救济费用占全年教育文化费的50%以上^[4]。1943年则占到60%^[5]。再次,1939年5月,国民政府为使高校适应战时环境,颁布《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明确规定大学的图书馆和注册、出版组一律隶属教务处,这使部分高校图书馆失去原隶属校长的行政地位,“图书馆经费”不再单独立项,“图书费”成为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的主要内容。

* 通讯作者:王晓军,ORCID:0000-0001-9544-6803,邮箱:wxfjun222@zju.edu.cn。

全面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大量教育经费用于学校师生员工的生活补助和救济以及高校组织机构的调整等因素,成为高校图书馆经费与战前相比,形成许多不同特点的基本原因。

2 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概况和特点

2.1 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统计中的经费列项问题

在对全面抗战时期的高校财务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中,首先会遇到一个相对公共图书馆而言比较棘手的问题:民国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在学校经费项目中是如何列项的呢?即如何从高校财务报表中准确统计图书馆经费呢?

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等问题,通常情况下,高校图书馆经费有两种列项方法:一种是列入“学术研究费”中,和仪器费并列,即“图书仪器费”;一种是按教育事业费列项,将图书费在“建置费”科目中列项^[6]。从有关图书费的材料来看,在全面抗战的前期,图书费通常列入“购置费”,中后期列入“学术研究费”。

2.2 战时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概况

在研究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问题时,还会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抗战时期的高校图书馆经费统计资料严重匮乏。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时曾陆续做过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经费调查统计。其中“图书仪器费”列入“学术研究费”科目中。从1937年到1945年,除1937年没有“学术研究费”科目数据外,1938年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总经费为31125068元,其中“学术研究费”为821110元,占当年总经费的2.638%,是“学术研究费”占当年专科以上学校总经费

比例最低的一年。1942年的“学术研究费”为20574086元,专科以上学校的总经费是233536650元,“学术研究费”占专科以上学校总经费8.81%,是“学术研究费”占当年高校总经费比例最高的一年^[7]。如果不考虑权重等因素的话,那么全面抗战时期专科以上学校“学术研究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可估算为6%左右。

但问题在于,“学术研究费”并不等于图书馆经费,除了图书费外,它还包括仪器费、学术研究补助费等细目。那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图书馆经费在“学术研究费”中所占比例到底是多少呢?

所幸的是,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得国民政府教育部门1940年的全国图书馆(室)调查统计,其中有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的经费数据。

由于缺乏全面抗战时期其他年度的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经费数,所以笔者只能以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统计部门的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经费统计数作为大致估算全面抗战时期各年度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经费数占学术研究费比例数的参考。

2.3 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安排及使用特点

全面抗战的爆发迫使高校图书馆调整服务模式,即由平时的全面开放转变为选取部分战时适用的教材和参考书籍随学校迁移,在迁移中为教学、科研提供临时性的、参考范围有限的服务,以尽力维持战时教学科研的运转。

高校图书馆战时工作重心的变化一般可分两个阶段:抗战爆发后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高校图书馆的任务是抢救、保护和转移图书;转移任务完成后,图书馆的工作重心进入第二阶段,即恢复图书的

表1 1940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经费、学术研究费及图书馆经费表

学校类型	总经费数(元)	学术研究费(元)	学术研究费占总经费比例	图书馆(室)经费	图书馆(室)经费占学术研究费比例
专科以上学校	61105940	4778151	7.819%	1030076元,另:14400美金,123321港币	三项合计1164146元,约占24.36%;
其中:国立	36788328	2499019	6.793%	682655	约占27%
省立	6019531	206229	3.426%	87337	约占42%
私立	18298078	2072903	11.329%	260084国币,14400美金,123321港币	三项合计394154元,约占19%

注:1.1940年的100港币兑换法币21.14元;美金与法币之比按1:7.5计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高校图书馆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 <http://www.cadal.zju.edu.cn/book/trySinglePage/09002157/1>);2.1940年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经费数据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图书馆室概况—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二十九年.全宗号:5(2),案卷号:880:166页:表146;3.1940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经费及学术研究费数额见参考文献^[7]。

阅览流通,采购和补充图书。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不同,导致高校图书馆的经费安排和使用特点不尽相同。

由于已经公开发表的档案史料的翔实性、完整性和不同高校在教育界的知名度不同等原因,本文以战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经费的安排和使用特点作为典型例证,来探讨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安排和使用的一般模式和特点。

2.3.1 抗战初期,高校经费安排侧重于学校搬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根据教育部指示向南方转移,在长沙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后又迁转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初期,该校首先面临的是因为上级经费紧缩而形成的经费紧张。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给长沙临时大学就经费事项发出指令:“令长沙临时大学:二十七年二十六日呈一件——呈送本校九至十二月份开支实况表、教职员俸给册及二十七年各月份紧缩预算分配表由。呈件均悉。查该校自上年九月份起,以原有北京、清华两校每月应领七成经费之半数 62416.66 元,暨南开大学每月应领七成补助费之半数 7000 元,及建设事业专款项下应拨南开大学每月七成补助费全数(并非半数)2333.10 元,合计月支 71749.76 元。九至十二月份共支 286999.04 元。”^[8]不仅长沙临时大学经费打折,即便是有限的经费在使用安排上也侧重于学校南迁搬运费以及临时租用校舍的修建费用。如 1938 年国家建设事业费专项建置费预算中,西南联合大学用于中小学教材教法参考书的专项图书费为 6000 元,而在“学术研究设备费”中列的图书仪器费 30000 元则全部用于清华、南开两所大学临时存放在重庆和天津的图书运往云南的费用^[9]。这个时期,长沙临时大学或西南联合大学向上级申请师生员工生活补助费以及各种补助经费到位后的分配办法几乎成为贯穿整个时期档案史料的主题。

2.3.2 战乱环境下,即使有少量图书馆经费也无法正常使用,只能挪作他用

战争环境不仅改变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正常经费安排,还改变了这些大学的正常图书馆业务,形成了战时三校图书馆几近无序的业务状态和战乱的大环境影响图书经费正常安排和使用的特点,其中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当时即使有图书经费也难以正常使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后,图书馆业务开始恢复,但在购书方面困难重重:“初人手时,最感困难者,厥为清理旧欠,均系二十六年六月以后,各国寄往北平书籍,经平保管委会转寄长沙者。当时南北多阻,邮递遗失,在所难免,在本馆不能确悉其书是否收到,未便付款,而书商则以旧欠未清,不肯徐寄新书。故二十七年六月至十二月,虽曾发出订书单六十余件,外商均置之不理。本年正月间,曾将请出旧欠,向政府请求外汇,但历经数月,迄无结果;三月中,内外迭经磋商,或暂还旧欠一部,或预付新书书款,始陆续有书寄来,而函件往返,延迟已达三月之久。付款之困难,乃在当时仅能购到英镑、美元、马克,荷盾直不易得,故向德、荷购书,付款须折合美元,尤多周折,而邮递迟缓,时多阻滞,亦为书到迟缓之重要原因。——中文书籍之购置,事变后在平完全清结,南迁后未再大量购置,嗣后拟就地搜集滇省出版书籍,略备他日之参考。”^[10]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工作状态使高校形成图书经费安排上的新特点:经费紧缺,但在实际中却用不完。如:“廿七年度图书经常费原定为 27000 元,至去年十二月底各系动用者甚少,实支之数为 14003.35 元,学校以年度急须结束,决定将余额 12946.65 元移作别用。”^[11]

2.3.3 高校图书费分配到院、系,基本延续战前图书采购费分配办法

经过抗战初期的高校迁移动荡之后,许多高校在避开战火直接袭扰的乡村、郊野、山区等地继续开展教学,即使这种平静是十分短暂的。学校一经恢复教学,图书馆的工作就随即展开。当时学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采购教材、教学参考用书以弥补迁移中的学校教学用书缺乏的困难。在经费分配方面,战时高校图书经费基本沿用战前盛行的办法,将经费额度分配至各学院、系,由各学院、系的教授以及承担教学一线任务的教师,根据图书馆能够得到的出版书目挑选购书书目,交图书馆集中办理订购。图书馆还要和会计科核对各院系的订购书目的数额是否超过经费的分配数额。超过部分则由图书馆和有关院系负责人商量扣减订购书目,移至下一次订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 年经图书委员会议决的图书经费 4 万元的分配情况如下:(1)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社会、哲学心理教育、法律、政治 6 系各 3000 元。(2)算学、物理、化学 3 系各 2000 元,(3)经济学、商学 2 系各 2500 元。(4)生物、地质地

理气象、土木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 6 系各 1000 元。(5)普通参考书 5000 元^[12]。其中普通参考书由图书馆负责选购。到抗战后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继续保持这样的图书经费分配办法。如 1944 年的图书费预算分配办法是将 120000 元的图书费按 4000 元一个单位,分成 30 个单位,由学校常务委员会分配给每个系一个单位,有些系因有数个专业组,那么这些专业组就只能得到一半甚至是四分之一单位的购书经费。负责选购通用参考书的图书馆则有 5 个单位的购书经费^[13]。

当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也是按照基本相同的办法分配购书经费:“本校共分六院二十三系:文理学院八系,本年度购书经费各千元;法商学院三系,除政经系定为一千五百元,其法律系及商学系各定为一千元;教育学院三系,除家政系系庚款补助外,教育系定为一千五百元,体育系一千元,农学院三系,除农学院定为二千元外,其林学系及农化系各一千元;工学院六系,除化工系及纺织系各一千元外,其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四系皆定为一千五百元;医学院不分系,定为四千元。以上各院系购书经费数目,系由本校常务委员会根据各该院系教职员及学生人数多寡决定之。此外本馆购书费亦一千元。为数确

不多,然处此国难期间,每年尚有三万一千元之购置经费,亦云幸矣。”^[14]

2.3.4 高校部分经费转用于“研究补助津贴”,图书费在购置费、学术研究费中的比例逐年减少

整个全面抗战时期,多数高校处于在困难条件下顽强生存的状态,因此这些高校的图书馆经费是在维持其存在的基本需求水平上徘徊。战时西南联合大学的图书经费也是在难为图书馆人满意却能被图书馆人理解的状态中曲折增长,折射出事业前行的艰辛。

从表 2 可见,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 1938 年的预算中,图书购置费为 54000 元,占全校购置费的一半左右。购置费占全校预算的 12%。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重新编制“岁出概算书”,将图书费从“购置费”中调整到“学术研究费”,数额改为 25800 元。从决算书来看,全年 50 万元的预算,决算为 48.9 万元左右,除办公费、杂支等部分有超支外,大部分项目的决算没有超出预算,图书费也仅支出 14000 余元。其原因应该与前述采购困难有关。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1940 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研究费每月预算由上一年度的 7233.33 元下降为 3392 元,图书费的每月预算由 2966.66 元下降

表 2 战时(战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图书费预(决)算简表(单位:法币元)

年份	图书费预算数	图书费决算数 (实支数)	购置费或学术研究费 预决算数额	占购置费或学术 研究费比例	备注
1937 年	(37 年 9 月 1 日至 38 年 4 月 30 日)36000	—	购置费预算数 68640	图书费占购置费预算 52.4%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办费中拨 40000 元图书费
1938 年	长沙临时大学预算 54000,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下半年岁出概算为 25800	当年西南联合大学的决算为 14053.35	购置费预算 102960 学术研究费决算数 30630.52	在学术研究费决算数中占 45.88%。	5 月由长沙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图书仪器费由烈于“购置费”改列于“学术研究费”
1939 年	35600	—	86800	41%	
1940 年	14304	—	40704	35.14%	
1941 年	18000	9372	100307	9.3%	《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第 402 页
1942 年	33600(岁出分配数)	—	744000(岁出分配数)	4.5%	
1943 年	379000	207433.98	2172046.82	按决算数 9.5%	第一次预算为 60000,后追加 319000
1944 年	120000	—	1578000	7.6%	
1945 年	—	—	4416000	—	仅在经常费预算分配表上见“学术研究费”
1946 年	—	—	17282400	—	同上

资料来源:1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经费预算”部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42—81;2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1—405。

为1192元,图书费在学术研究费中的所占比例由41%下降到35.14%,下降比例并不十分明显。但从1941年起,图书费在学术研究费中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图书费的实际支出仅占学术研究费实际支出的9.3%,1942年图书费岁出分配数竟仅占学术研究费岁出分配数的4.5%。

什么原因导致图书费在“学术研究费”中所占比例锐减呢?

从有关史料可见:1942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研究费”744000元中,“研究补助费”的预算数为654000元,占88%之多^[15]。而1939年的“研究补助费”预算数为13200元,占当年“学术研究费”86800元的15.2%,1940年的“研究调查补助费”预算数是7200元,占当年“学术研究费”40704元的17.6%^[16];通过对“学术研究费”中的“研究津贴”数额的变化的对比,一个清晰的事实出现在我们眼前:1942年的学术研究补助费数额被大大提高了。换句话说,在“学术研究费”中,学术研究补助费大幅度提高,导致图书经费相应减少了。

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中可以查阅到,在1941年以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对本校师生员工有多次生活补助的措施,但未见其补助费明确列支项目。1941年底,学校常委会决定,一旦下年度学校经费增至3750000元,则按员工工资额加发35%的“研究补助费”,月薪200元以下者加发70元,月薪不到70元者按原额加发一倍;在随后的第203次会议上进一步规定,本校讲师自1942年1月起每小时加研究补助津贴10元,附属中小学教职员每人每月发研究补助津贴50元^[17]。

这就是学术研究补助津贴快速增长的原因。即从1942年开始,“学术研究费”中的“研究补助费”主要用于教职员的生活补助金。到1943年,补助费额进一步增加:“教育部电通知学术研究补助费已核准,从本年四月份起,教授每月五百元,副教授每月三百八十元,讲师每月二百五十元,助教每月一百三十元,并已寄来五十万元,现在决按西南联合大学所任职务予以待遇。”^[18]可见,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在“学术研究费”中大幅度提高“研究补助费”比例,压缩图书费,是根据战时物价飞涨、教职员生活困难的现实,加上图书仪器购置途径不畅等情况,为尽可能解决教职员的生活困难、稳定教职员队伍、提高教师教学积极性,保障学校教学正常进行而采取的无

奈之举。

2.3.5 外汇价格波动和外汇管制对外文书刊选购困扰颇多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图书资源采访的侧重上有所不同。高等院校出于教学、科研的需要,除了对中文图书、期刊有一定需求外,对外文原版图书杂志的需求量比较大,有些高校尤其是一些私立教会院校则直接采用外文原版教材作为教学用书。

战前的国立省立高校图书馆采购外文图书杂志的主要途径是根据本校的需要,向教育部申请外汇额度,经教育部审核转向财政部申请,获得官方外汇额度后下发学校,然后学校根据官方的价格(战前官方价一般是3.3元国币购换1美元)购入美元、英镑等外汇,汇给外文图书杂志订购代理商,从代理商那里获得所需外文书刊。由于申请外汇额度批复的时间往往较长,有些国立、省立高校或者私立高校也会在外汇交易市场自行交易少量外汇,用以采购一些急于获得的书籍。

抗战初期,各公共图书馆、各大学通过上海、香港等地采购图书补充馆藏。在抗战爆发的起初两年,高校购书尤其是通过海外采购教学、科研参考图书的途径还能勉强运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高校图书馆采购外文图书期刊的工作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外汇的价格波动对实际采购力的影响;第二个影响是国民政府采取的外汇管理制度,申请外汇不仅额度上要打折扣,审批时间也更为拖延。三是由于欧洲战事爆发,外文原版图书杂志在进口代理、运输等方面受到影响,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中国一度处于被完全封锁的状况,导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基本瘫痪。这样的情况下,高校对外采购图书期刊的工作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些因素对高校图书馆发生严重影响,导致高校先是无法正常得到外汇,随后即使有外汇也无法及时采购到所需要的外文书刊。

汇率的起伏以及战时外汇管理制度对战时高校使用外汇购置外文书刊有很大影响。1938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各学校各文化机关购买外国书籍杂志刊物申请外汇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申请外汇选购外文书刊的范围以下列限:“1. 有关陆海空军军事者。2. 有关陆海空军兵器技术者。3. 有关各种工矿业技术者。4. 有关国际政治及外交动态者。5. 新近出版之各种自然科学书籍、杂志、

刊物。6. 新近出版之财政经济统计年鉴或书报。”^[19]这一规定不仅使高校图书馆选购外文书刊品种时受一定限制,还使一些高校认为非国防类外文书刊的选购难以通过外汇管理机构审批。国立浙江大学在1939年下半年的图书馆近况报告中述说了外汇波动和西文图书购办的困难:“征购图书近来外汇高涨,而向政府请购外汇,又常遭稽留迟延,故购置西文图书,极为困难。最近财政部限制外汇之请求,且规定凡非与国防有关之图书,一律从缓购置,故一年来该馆因征购西书而向财部请购外汇,亦有多起。”^[20]

外汇的兑换价格波动,申请外汇程序的繁琐,各校自行采访的纷乱,造成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在外购图书杂志方面困难重重。

2.3.6 进口运输途径遭到战争破坏,进口图书在口岸积压,难以发挥作用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发现各高校自行购置外文图书期刊仪器过程中的问题后,采取了由教育部牵头申请外汇,然后按一定额度分配给各个高校的应急办法。操作程序是由各个高校按分配到的数额根据进口书目挑选书刊,申报教育部集中,由教育部通过中央信托局在海外采购世界主要理工农医类科学图书和杂志,经广州、香港以及中缅、中印等口岸转运回国,分配给国内各大学图书馆作为教学科研参考之用。这样,形成了由中央部门根据各高校提请的购书单集中统一使用经费,各高校得到的是外汇额度指标,而不是实际外汇的模式,形成高校在零星申请外汇、自行采购之外,增加由教育部分配额度、集中报交教育部代办的外文书刊获取多渠道并存的局面。这是抗战时期高校图书经费使用的一大特点。

1939年,教育部直接致电西南联合大学:“查各院校设备简陋,亟应充实,经呈奉核准支拨美金二十万元,充国立各专科以上学校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兹由部统筹支配,该校购置图书、仪器费美金12000元,仰即开列拟购图书、仪器清单,注明中英文名称,著作人姓名,发售商号、数量估价、约重等项,在文到二日内,已最速邮递方法寄部以凭汇核,转请财政部在美洽购,万勿稍延为要。”^[21]

1940年,教育部继续在原计划拨款基础上,增拨美金20万元采购国际学术图书、杂志,充实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图书资料。以后教育部数度申请拨付美金采购国外图书、杂志,全年达到100万美金的额

度。同样,1941年,“教育部为充实专科以上学校设备,经于三十年度将国立各校建设费,由一百十八万元增加为一百六十万元;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由一百万增加为一百八十万元。又先后请拨美金一百万元,统筹购置图书仪器。”^[22]

但是,战况的变化迅速给重新振作中的高校外购图书期刊工作以新的打击。

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教育部采购国外图书仪器的进口途径不得不经印度、缅甸转运云南进入国统区,然后按配额发放各大学图书馆。因为运输上的困难,加上日军袭扰,特别是滇缅公路一度被封闭,仅有美国的航空队通过珠峰从印度空运物资,各种进口、援助物资受阻严重。教育部进口转运的图书仪器第一次运入昆明115箱,第二次运入57箱后,有28吨的进口图书仪器在印度被滞留、积压^[23]。以后每年教育部都申请调拨相当数额的外汇进口图书仪器,但截至抗战结束,从云南转运入境内的图书仪器仅424箱。一些高校只能将自己分得的美金额度和本校用国币换购的外汇存于中央信托局的境外账户上无奈地等待采购图书仪器。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前,因需购买英文图书,尚可请领外汇。今则交通困难,国外购书无形停顿。”^[24]这种情形造成抗战期间国内图书因为出版印刷流通等问题而供不应求,国外图书因为外汇管制、进口途径狭窄、交通运输困难等诸多原因而无法输入的困难局面。

总之,抗战时期图书经费短缺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对国统区的高校图书馆来说,如何采购到对教学科研有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反过来牵制了图书馆经费的合理安排和使用。

3 结语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图书馆事业这一“生命体”的发展中,图书馆经费起着“血液”的作用。对这一“血液”的研究涉及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国家政治制度、教育体制以及金融、货币等多领域多层次多方面。通过对图书馆经费的研究,去发掘、揭示图书馆发展历程中蕴藏的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深层内涵,这应该是今天研究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图书馆经费问题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557.
- 2 第二编,统计:历年上海黄金市价表(二)[DB\OL].朱斯煌.民国经济史[G].银行学会编印,1947:517-518. [2017-01-11] <http://www.cadal.zju.edu.cn/book/trySinglePage/11103061/1>.
- 3 附件:国难时期各项支出紧缩办法[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3-14.
- 4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教育部工作报告[A].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2(58):293-357.
- 5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教育部工作报告[A].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2(58):357-389.
- 6 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概况 [DB\OL]. 1939:18-19.[2017-02-02]. <http://www.cadal.zju.edu.cn/book/trySinglePage/16008277/1>.
- 7 全国公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二十五至三十四学年度岁出经费分配表[K].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21-23.
- 8 教育部关于经费给长沙临时大学的指令[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
- 9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国家建设事业费专款项下建置费预算[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54.
- 10 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 [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304-307.
- 11 图书设计委员会廿八年度第一次会议记录[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317-318.
- 12 西南联合大学关于图书经费等问题的函件[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97.
- 13 西南联合大学关于图书预算分配办法[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32-133.
- 14 何日章.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周年工作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13(2):5.
- 15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岁出预算分配表[A].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02-403.
- 16 经费预决算[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2-81.
- 17 第二〇二次会议,第二〇三次会议 [A].张爱蓉、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213-215.
- 18 第六届第一次会议 [A].张爱蓉、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7.
- 19 国民政府财政部.各学校各文化机关购买外国书籍杂志刊物申请外汇办法[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1003.
- 20 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近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14:(2\3):20.
- 21 西南联合大学关于争取教育部拨款购图书、仪器函黄珏生[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34.
- 22 中国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行政院教育工作报告[A].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G].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2(58):193-209.
- 23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行政院教育工作报告 [A].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 [G].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2(58):389-401.
- 2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18(5/6):2-4.

作者单位:王晓军,浙江大学图书馆,杭州,310028

隋红岩,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310018

收稿日期:2017年2月13日

A Brief Account on the Expenditure of Academic Library of China in Period of the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War

Wang Xiaojun Sui Hongyan

Abstract: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due to breaking out of the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war, the college libraries striving to serve for teaching showed different status in library budgets and expenditure, such as actual purchasing power decreasing due to the inflation; difficulties of purchasing teaching books;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nd difficulties of acquisition of foreign books and journals with no delay.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College libraries; Library Expenditure and Budget